

摘要

固原地处黄土高原西北边缘地带，是古代丝绸之路东段北道上的重要交通枢纽，不同民族的文化在这里相互交融。墓葬作为保存古代文化艺术遗产的重要资源，能够反映出不同时代的民族文化交流。固原北周墓葬文化所呈现的文化交流现象记录了这一时期不同民族的文化在此汇聚、交流的历史。

李贤、田弘、宇文猛是北周时期重要的历史人物，他们的墓葬以及其他纪年明确的墓葬可以客观反映出北周时期这一地区的东西文化交流情况，以及北方地区民族文化的互动与交流。研究表明北周墓葬在经历了时代变迁和民族交融之后，墓葬文化呈现出多元特征。无论是墓葬的形制、葬具，还是出土的随葬品，如鎏金银壶、玻璃碗、金戒指、仪仗俑等可以反映出西域文化和鲜卑族文化特点。此外，墓葬中也反映出了汉文化，尽管不同民族文化在此地相互交流，但是在中原汉文化的影响下，不同民族的文化交流与联系加深，为当地的文化繁荣奠定了基础。

本文将固原北周墓葬中所反映的文化交流为研究对象，通过墓葬所呈现的文化现象，窥探北周时期当地的文化交流状况，分析影响文化交流的因素，以及文化交流所产生的影响与意义。

关键词:文化交流;北周墓葬;固原

目 录

绪论	1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1
二、学术史回顾	2
三、研究方法	8
四、重点、难点及创新之处	8
第一章 固原自然地理概况与历史概述	10
第一节 固原的自然地理概况	10
第二节 固原历史概述	13
第二章 固原北周墓葬概况	16
第一节 固原北周墓葬的分布与发掘	16
第二节 李贤墓	19
第三节 田弘墓	23
第四节 宇文猛墓	28
第五节 纥干莫何弗墓	31
第三章 固原北周墓葬中所呈现的文化现象	37
第一节 墓葬所见汉文化现象	37
第二节 墓葬所见鲜卑文化现象	47
第三节 墓葬所见西域文化现象	51
第四章 固原北周墓葬所见多元文化交流	58
第一节 随葬品中所见文化交流	58
第二节 墓葬所见汉文化的继承与发展	63
第三节 从北周墓葬看文化交流的影响与意义	65
结语	68
附录	69
参考文献	74
致谢	78

图 目

图 1-1 固原区域图.....	12
图 1-2 固原地区行政区划图.....	13
图 2-1 固原北周墓分布图.....	17
图 2-2 固原南塬古墓群.....	17
图 2-3 李贤墓遗址.....	20
图 2-4 李贤墓剖面图.....	20
图 2-5 田弘墓平面图.....	25
图 2-6 宇文猛墓剖面图.....	29
图 2-7 M22 平剖面图.....	32
图 2-8 M22 墓葬全景（北-南）.....	32
图 3-1 田弘墓志.....	39
图 3-2 李贤墓志.....	40
图 3-3 李贤墓执刀武士图.....	42
图 3-4 史射勿墓执刀武士图.....	42
图 3-5 李贤墓双层门楼图.....	43
图 3-6 李贤墓单层门楼图.....	43
图 3-7 田弘墓出土陶鸡与陶狗.....	44
图 3-8 宇文猛墓出土陶碓与陶灶.....	45
图 3-9 田弘墓五铢钱.....	46
图 3-10 田弘墓永安五铢.....	46
图 3-11 田弘墓布泉.....	47
图 3-12 北魏漆棺.....	49
图 3-13 李贤墓风帽俑.....	50
图 3-14 宇文猛墓风帽俑.....	50
图 3-15 李贤墓出土鎏金银壶.....	52
图 3-16 鎏金银壶.....	52
图 3-17 胡人头像.....	52
图 3-18 李贤墓金戒指.....	53
图 3-19 金戒指.....	53
图 3-20 李贤墓玻璃碗图.....	55

绪论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墓葬是保存古代文化艺术遗产的重要资源，它能够反映出古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发展，也体现出不同时代的民族文化交流。北周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民族交流交融的一个时代，政权更替和战争不休使得这一时期的社会融合了不同的民族文化。这种文化交流与民族融合可以在墓葬中得以体现。

固原是我国历史上重要的西北军事重镇，如顾祖禹所述：“左控五原，右带兰会，黄流绕北，崆峒阻南。”^①因其地理位置特殊，固原成为古代兵家必争之地。特别是在北朝时期，因游牧民族南下夺取政权，固原一带先后被不同政权纳入统治范围。北周建国关陇，继承了北魏在西北的地盘。因此地靠近长安而受统治者重视，在此安排朝中要员驻扎治理，其中包括李贤、田弘等人。早在秦汉时期，固原地区已经与西域进行着友好的贸易往来，西汉时期官方的丝绸之路开通以后，固原成为东西方沟通往来的重要节点。北魏太延二年在此置高平镇，又改为原州^②，北周时袭之并置原州总管府^③，因此固原在当时称原州。北周时以经略西域为国策，继续坚持与西域各地及域外各国的贸易，并保持友好往来。尽管这一时期在丝绸之路上的贸易往来处于大分裂、大动荡的历史环境中，但民族交融与文化交流也使得中、西亚及北方游牧民族的艺术文化源源不断传入固原。

固原地区与西域的友好往来，以及游牧民族文化的扎根融合，使得这一地区文化呈现出多元性、包容性的特点。在与其他民族文化交流的同时，中原的传统文化也在继续发展。固原自古以来畜牧业发达，作为关中的北方门户，南方的农耕文化深刻影响着固原的社会文化。这种传统文化的继承发展与多民族文化的融合不仅影响着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发展，也影响当地人们的葬俗。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起，考古工作者等墓葬在固原发现了不同时代的物质文化遗存，其中包括著名的北周李贤墓、田弘墓、宇文猛墓。虽然北周在南塬古墓群中占比不重，但是它们所反映出的文化特征极具研究价值，墓葬的形制、葬具，以及出土的随葬品，如波斯鎏金银瓶、玻璃碗、嵌宝石金戒指、环首铁刀、金币、庖厨陶模型等。墓葬规模及随葬品种类、数量间的差异，能够反映墓主人生前的等级地位、丧葬习俗以及社会伦理。通过这些墓葬，我们不仅可以了解北周时期

①（清）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卷58《陕西》，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2801页。

②（北齐）魏收：《魏书》卷160《地形志》，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622页。

③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博物馆，中日原州联合考古队：《原州古墓集成》，北京：文物出版社，第10页。

当地的物质文化生活，也可以窥探当时的多民族交融与传统文化发展的历史。故本文拟对当地纪年明确的北周墓葬所反映出的文化展开研究，并分析其存在的原因。

二、学术史回顾

学术界对于北周墓葬的相关研究较为成熟，就研究内容来看主要分为两大类：一部分学者注重对墓葬的形制、葬式、葬具等进行研究，分析其特点与源流。还有一部分学者注重对墓葬中的随葬品进行研究，如对随葬品的质地、来源、摆放位置、文化特征等进行研究。在学术史回顾中，笔者将从对固原北周墓葬整体的研究、墓葬所反映的文化两个大方面进行梳理。

（一）对固原北周墓葬的研究

墓葬是承载社会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通过墓葬可以认识社会历史及其背后所反映出的文化。固原北周墓葬的发现也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对固原北周墓的研究成果较丰富，内容主要集中于墓葬形制、葬俗、随葬品、墓主人等多方面进行研究。

关于北周墓葬，罗丰做了丰富的研究，在《胡汉之间——“丝绸之路”与西北历史考古》^①中论述了上世纪北朝至隋唐时期的宁夏考古工作，对固原北周墓葬的基本情况做了梳理，并对其随葬品做了细致的研究，包括鎏金银壶、东罗马金币、墓志等随葬品。中古时期不少来自中亚的人进入固原，并进行贸易和定居。此文以丝绸之路贸易大背景看固原与中亚地区的文化交流。在研究固原古墓葬时，对墓葬中所反映的文化做了论述。中日联合原州考古队的《原州古墓集成》^②一书，收录了诸多关于北周考古的内容，从固原史地写到丝绸之路发展，再到对墓葬、文物的研究。原州联合考古队的《北周田弘墓》^③，全面整理了田弘墓中的随葬品，并分析了其墓葬形制、葬式和葬具，也对墓葬中的人骨做了人种鉴定，认为田弘应是北方少数民族。马建军的《二十世纪固原文物考古发现与研究》^④对这一地区的墓葬做了较为全面的分析研究，其中收录了对北朝至隋唐时期墓葬相关问题的思考。同时对墓葬壁画做了深入的研究，分析壁画图像，结合同期的壁画墓做对比，拓宽了我们对北朝至隋唐时期墓葬壁画的认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① 罗丰：《胡汉之间——“丝绸之路”与西北历史考古》，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

② 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博物馆，中日联合原州考古队：《原州古墓集成》，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年。

③ 原州联合考古队：《北周田弘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年。

④ 马建军：《二十世纪固原文物考古发现与研究》，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4年。

的《中国考古学魏晋南北朝卷》^①对北朝墓葬类型演变做了整理,按照不同墓葬的规模、形制、结构和出土文物的不同,将北朝墓葬分为三类,也对固原北周墓葬的形制做了划分。韦正的《魏晋南北朝考古》^②一书,将不同地区的北朝墓葬做了归纳,系统论述了隶属关中地区的固原北周墓葬的基本情况。郑岩《魏晋南北朝壁画墓研究》^③对北周时期壁画墓的保存情况做了介绍,对固原北周壁画墓的形制和壁画做了研究。韩兆民的《宁夏固原北周李贤夫妇墓发掘简报》^④整理了李贤墓的基本情况,包括墓葬形制、葬具及出土文物,并进行了系统分析。宁夏文物考古所固原工作站的《固原北周宇文猛墓发掘简报》^⑤也对宇文猛的基本情况做了整理,并对其随葬品做了分类。郑如珀的《墓葬、美术与政治——宁夏固原北周李贤墓再思考》^⑥一文,从艺术史视角对李贤墓进行研究。文中提及在北朝时期流行薄葬的背景中,礼制对随葬俑群的数量、质量的严格限制下,古人通过加长墓道、增开天井等手段,用来表现墓主的身份地位。

学术界对墓葬研究的同时,也对墓志及墓主人做了讨论,主要有:《李贤夫妇墓志考略》^⑦一文,对李贤墓志进行了考释,根据相关史料和墓志对李贤的族属、家世、籍贯做了研究,勘误了史料中关于李贤官职的记载。运用史料着重分析了李贤族属、家世、籍贯的记载问题,认为李贤远祖为鲜卑人。顾铁符的《关于李贤氏姓、门望、民族的一些看法》^⑧从相关史料和墓志中的信息推测他为鲜卑族。陈仲安在《李贤墓志申论》^⑨一文对李贤墓志铭进行了研究,认为李贤一族为胡人,并且很可能为高车族。又在文中指出《北史》中关于对追赠李贤曾祖司空的错误记载,应追赠为其父文保。周佩妮的《北周田弘墓出土文物的重要学术价值》^⑩一文结合相关史料记载,对田弘墓志进行了研究,认为田弘的族属或为鲜卑族。马建军的《北周田弘墓出土玻璃器探析》^⑪一文虽然以玻璃器为研究对象,但在文中也对田弘的生平及族属做了讨论,认为田弘是鲜卑族。李茹在《河西公与莫高窟》^⑫一文运用墓志和史料,研究李贤西刺瓜州与敦煌的历史。李贤西魏时因官寓家于敦煌,由此,作者推测第290窟窟主可能为李贤,窟内供养人画像是李贤亲族及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魏晋南北朝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

② 韦正:《魏晋南北朝考古》,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

③ 郑岩:《魏晋南北朝壁画墓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年。

④ 韩兆民:《宁夏固原北周李贤夫妇墓发掘简报》,《文物》1985年第11期。

⑤ 宁夏文物考古所固原工作站:《固原北周宇文猛墓发掘简报》,《宁夏考古文集》,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4年。

⑥ 郑如珀:《墓葬、美术与政治——宁夏固原北周李贤墓再思考》,《艺术与科学》2007年第5期。

⑦ 罗丰:《李贤夫妇墓志考略》,《美术研究》1985年第4期。

⑧ 顾铁符:《关于李贤氏姓、门望、民族的一些看法》,《美术研究》1985年第4期。

⑨ 陈仲安:《李贤墓志申论》,《文物》1985年第11期。

⑩ 周佩妮:《北周田弘墓出土文物的重要学术价值》,《宁夏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4期。

⑪ 马建军:《北周田弘墓出土玻璃器探析》,《宁夏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4期。

⑫ 李茹:《河西公与莫高窟》,《丝绸之路》2009年第14期。

其官衙僚属，这为分析李贤墓中随葬品的来源提供了思路。李鑫、禹凤的《北周李贤及其家族》^①一文梳理了史料中对李氏一族的记载，并且讨论了李贤墓在丝绸之路中的地位和作用。薛正昌的《李贤传略》^②一文中结合相关史料记载分析了李贤的族属与籍贯问题，认为李贤应为汉族。但是因史料记载与文物的相互印证，以及其一生的经历，认为并不排除他在婚姻时有拓跋鲜卑的因素。

（二）对墓葬所反映文化的研究

固原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交通枢纽，长期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为当地的文化繁荣奠定了基础。北周墓葬出土的文物种类丰富，造型艺术风格独特，反映出当时的多元文化互动情况。

学术界对墓葬中所见文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讨论中西文化交流，从不同随葬品中看当时的固原地区存在何种文化。并在相关著作中对墓葬中所见的文化做了研究。《固原南郊隋唐墓地》^③一书中对宁夏固原地区的墓葬壁画进行了研究，从壁画中分析其中所体现的文化。《丝绸之路考古》^④一书中收录了安家瑶、霍巍、宿白、齐东方、郑岩等学者对不同时期丝路遗存的研究成果。通过讨论文物、葬俗，研究文化的来源问题，以此分析游牧文化、西域文化与中原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赵丰的《丝绸之路美术考古概论》^⑤一书整理了丝绸之路考古成果，涉及了固原北周墓葬中的随葬品。按照随葬品的质地分章节论述时，在金银器一章中分析了魏晋时期由外国输入的金银器，讨论其来源及艺术特征。通过对比其它地区出土的萨珊式器皿，分析认为李贤墓的萨珊式银壶是受希腊化影响的产物，制作地点应在中亚。贺云翱、邵磊的《中国金银器》^⑥一书中将不同朝代的具有代表性的金银器按照造型工艺特点做了归纳。书中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外交往进一步扩大，金银器的制作工艺上表现出的异域文化特征更加具体，对李贤墓中出土的鎏金银壶的造型、工艺和人物形象做了分析。沈福伟在《中国与西亚非洲文化交流志》^⑦中分析了伊朗玻璃器的源流，梳理了传入中国的玻璃器皿的分布情况及工艺美术特征，将伊朗的玻璃器做了分型整理，认为李贤墓出土玻璃碗属于突起圆形凹球面装饰碗。因固原长期受游牧民族文化影响，亦有学者对游牧民族文化进行了研究。中日联合原州考古队的《原州古墓集成》^⑧一书结合史料分析当时

① 李鑫，禹凤：《北周李贤及其家族》，《文物天地》2020年第11期。

② 薛正昌：《李贤传略》，《固原师专学报》1997年第5期。

③ 罗丰：《固原南郊隋唐墓地》，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年。

④ 罗丰：《丝绸之路考古》，北京：科学出版社，2020年。

⑤ 赵丰：《丝绸之路美术考古概论》，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年。

⑥ 贺云翱，邵磊：《中国金银器》，北京：中央编辑出版社，2008年。

⑦ 沈福伟：《中国与西亚非洲文化交流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

⑧ 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博物馆，中日联合原州考古队：《原州古墓集成》，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年。

的文化背景,对研究西亚文化在我国中古时期的传播有重要参考价值。韦正的《魏晋南北朝考古》^①除了前文所述对固原北周墓葬做了介绍,还在书中第五章通过金银器、罗马金币等随葬品讨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外文化交流。孙危的《鲜卑考古学文化研究》^②一书系统整理了国内出土的鲜卑墓葬,其中包括固原地区的鲜卑墓。书中论述了鲜卑文化的发展过程和鲜卑文化特点,总结鲜卑族的考古学文化特点包括梯形墓穴、梯形棺;侈口长腹罐;金属牌饰和桦皮器四大特征。

此外,还有一些学术论文在研究墓葬壁画时研究了其艺术风格和文化源流。耿志强《固原北周壁画墓与艺术风格》^③一文对固原北周墓里的壁画内容和风格做了分析。冯国富先生认为西魏至北周时期,这一地区与西域敦煌地区之间存在绘画艺术方面的交流。这些壁画的内容主要为一种有规律的人物排列画面,冯国富认为这种排列方式似乎是当时兵符制度的缩影。这为我们分析当时的政治、军事制度提供了思路。冯国富在《固原北周李贤墓壁画简论》^④中将李贤墓中的壁画分为侍卫图、门楼图、侍从伎乐图三类。根据侍从身上的乐器分析当时中西方乐舞艺术,为研究北周时期文化交流提供借鉴。陈彦平的《固原北朝隋唐墓葬图像研究》^⑤一文讨论了李贤墓和田弘墓壁画的图像渊源,分析人物着装及乐器,认为壁画中反映出了胡汉文化融合与中西文化交流。徐青青在《固原地区北朝至隋唐时期墓葬壁画研究》^⑥中总结了北周墓葬壁画的艺术特色,壁画不仅保留北魏的典制,也具有强烈的北方疏体风格,与初唐的绘画风格相近。韩有成的《宁夏须弥山北周洞窟建筑及造像探析》^⑦一文在探究须弥山北周洞窟的建筑时,分析了北周洞窟形成的历史背景,认为像李贤、窦炽等显贵对当地的佛教发展有推动作用。因此,我们可以思考这一时期的固原佛教发展情况,以及哪些方面受印度文化影响。

除了以上的研究之外,还有一些学术论文从随葬品的角度出发探讨文化交流问题。研究较多的是以李贤墓出土的鎏金银壶分析体现出的文化。罗丰在《北周李贤墓出土的中亚风格鎏金银瓶——以巴克特里亚金属制品为中心》^⑧一文中依据图文和史料对银壶的故事内容进行辨释。作者对该银壶的装饰纹样、图像做了细致的解读,再对比分析其他地区出土的同类器物,并整理出文献中关于这类器物

① 韦正:《魏晋南北朝考古》,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

② 孙危:《鲜卑考古学文化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年。

③ 耿志强:《固原北周壁画墓与艺术风格》,《西夏研究》2013年第4期。

④ 冯国富:《固原北周李贤墓壁画简论》,《固原师专学报》1991年第2期。

⑤ 陈彦平:《固原北朝隋唐墓葬图像研究》,博士学位论文,西安:陕西师范大学,2020年。

⑥ 徐青青:《固原地区北朝至隋唐时期墓葬壁画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兰州:西北师范大学,2016年。

⑦ 韩有成:《宁夏须弥山北周洞窟建筑及造像探析》,《文物春秋》2006年第5期。

⑧ 罗丰:《北周李贤墓出土的中亚风格鎏金银瓶——以巴克特里亚金属制品为中心》,《考古学报》2000年第3期。

的记载。文中引用众多国外学者对此物艺术源流讨论的观点，并认为这件波斯萨珊银壶应是具有古希腊的文化特征。吴焯的《北周李贤墓出土的鎏金银壶考》^①一文分析了银壶图像内容，分析人物服饰特征和器物造型。这些文物出现在固原得益于中西交通路线的畅通，认为该银壶可能出自客籍中亚的罗马工匠的作品，是在古希腊、古罗马文化影响下产生的制品。马萨柯、穴泽咏光和张鸿智的《宁夏固原李贤墓及其中出土的饰以古希腊神话故事的鎏金银壶述评》^②一文先介绍了李贤及其墓葬，认为李贤的先祖系拓跋鲜卑氏。文中认为此壶出自萨珊时代，为巴克特里亚制品，最后讨论了壶身浮雕内容的来源，认为其原始资料源于古希腊故事。马莉的《宁夏固原北朝丝路遗存显现的外来文化因素》^③一文中论述了固原地区的北朝丝路遗存中的外来文化因素，根据随葬品的艺术特征分析认为该时期的墓葬中有鲜卑、哒、波斯萨珊、罗马几种文化因素。周佩妮的《北周田弘墓出土文物的重要学术价值》^④一文分别从墓葬、墓志、壁画、金币四个方面做了讨论，并对其墓葬壁画的学术价值、东西方贸易问题做了论述。

从货币和玻璃器中展开文化研究的论文也有不少。马建军在《宁夏境内考古发现的丝绸之路古国金银币考》^⑤一文对田弘墓中发现的五枚东罗马金币的纹饰进行了研究。同时也归纳出这些金银币的传播路线与北朝至隋唐时期所见其它金银钱一样，沿丝绸之路由西向东传播，且主要钱币类型为萨珊银币、东罗马金币和东罗马金币仿制品。同样，马彩虹、徐海荣的《浅述田弘墓出土的东罗马金币》^⑥一文也从金币出发讨论了古代中国与西方的贸易往来。文中对墓中发现的五枚东罗马金币进行了研究，认为从列奥一世到查士丁尼一世在位期间的钱币属于原始真币。又论述了东罗马金币在中国的发现情况，认为东罗马金币的东传既与政治外交有关，也是东西方贸易和文化交流背景之下的产物。就玻璃器的研究，主要有：安家瑶的《北周李贤墓出土的玻璃碗——萨珊玻璃器的发现与研究》^⑦一文，文中对玻璃碗的成分和制作工艺做了分析，将李贤墓中的玻璃碗与北京西晋华芳墓的玻璃碗、湖北鄂城西晋墓的玻璃碗、新疆楼兰出土的玻璃杯和巴楚采集的玻璃残片做了对比分析，认为这几件玻璃器均具有波斯艺术特征。后来又在《丝绸之路与玻璃器》^⑧一文梳理出丝路沿线墓葬所发现的各类玻璃器皿，包括固原北周

① 吴焯：《北周李贤墓出土的鎏金银壶考》，《文物》1987年第5期。

② 马萨柯，穴泽咏光，张鸿智：《宁夏固原李贤墓及其中出土的饰以古希腊神话故事的鎏金银壶述评》，《固原师专学报》1992年第2期。

③ 马莉：《宁夏固原北朝丝路遗存显现的外来文化因素》，《丝绸之路》2010年第6期。

④ 周佩妮：《北周田弘墓出土文物的重要学术价值》，《宁夏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4期。

⑤ 马建军：《宁夏境内考古发现的丝绸之路古国金银币简考》，《中国钱币》2016年第6期。

⑥ 马彩虹，徐海荣：《浅述田弘墓出土的东罗马金币》，《文物天地》2020年第11期。

⑦ 安家瑶：《北周李贤墓出土的玻璃碗——萨珊玻璃器的发现与研究》，《考古》1986年第2期。

⑧ 安家瑶：《丝绸之路与玻璃器》，《文物天地》2021年第12期。

墓中出土的玻璃器，又从丝路交通的角度分析玻璃器传入的文化背景。马建军在《北周田弘墓出土的玻璃器探析》^①一文对玻璃器做了研究，提到了经过化学鉴定其成分，推测原料产地，认为这些玻璃器一部分生产于本地，另一部分可能来自于西域或者中原以外的其它地区。

固原北周墓葬中的陶俑具有鲜明的外来文化特征，学术界从其排列布局、陶俑着装方面做了较多研究。刘勇、王竞的《固原地区出土的北朝时期陶俑服饰浅析》^②一文梳理了陶俑的出土情况，分析陶俑的服饰和头饰，认为陶俑具有鲜卑文化和西亚文化的特点。李彦霞在《李贤墓陶俑的造型艺术特征》^③中讨论了李贤墓出土陶俑的造型艺术特征，认为出行仪仗俑的造型可以反映出游牧民族的服饰文化。董雪迎在《北朝晚期单模陶俑研究》^④一文中提到单模陶俑是北朝晚期极具时代特征的陶俑类型，根据出土墓葬的分布情况将地区分为关东和关陇两个区域来研究，分析陶俑所反映出的文化。姚蔚玲的《宁夏固原北朝墓葬初探》^⑤一文归纳整理了固原北朝陶俑，将其与陕西的北朝墓葬作比较，认为这两地区的墓葬的随葬品均以陶俑为大宗。王东的《北周李贤墓学术座谈会概述》^⑥将座谈会中关于李贤墓的陶俑布局 and 表现题材、陶俑造型和艺术风格等内容的讨论观点做了整理，提出李贤墓与隋唐墓之间有一定关联。王卫明的《北周李贤夫妇墓若干问题初探》^⑦一文对该墓葬的文物做了专论。文中将该墓葬里的陶俑与山西大同、河南洛阳地区的北魏陶俑做了对比分析，讨论其中的承袭关系。杨泓在《北朝陶俑的源流、演变及其影响》^⑧一文中分析了北朝陶俑的组合，认为北周、北齐的陶俑继承了北魏陶俑的组合特点，陶俑组合主要包括武士俑、镇墓兽、侍从俑及庖厨明器。杨泓在《略论北周李贤墓的陶俑和铁刀》^⑨一文中，对陶俑艺术风格做了研究，认为陶俑的造型工艺继承于西魏，延续了关中地区北魏陶俑的艺术，保留着十六国遗风。

诚然，学术界前辈对固原北周墓已经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研究，在墓葬壁画和随葬品方面有较多的研究成果。关于随葬品的研究以金银器和陶俑较多，关于陶俑的研究，主要倾向于俑群组合与造型特征、艺术风格的承袭方面。而关于这一时期墓葬所反映的文化因素缺乏综合性研究。虽然北周墓在当地的古墓群中占比

① 马建军：《北周田弘墓出土玻璃器探析》，《宁夏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4期。

② 刘勇，王竞：《固原地区出土的北朝时期陶俑服饰浅析》，《文物天地》2020年第11期。

③ 李彦霞：《李贤墓陶俑的造型艺术特征》，《大众文艺》2015年第21期。

④ 董雪迎：《北朝晚期单模陶俑研究》，《文物春秋》2020年第6期。

⑤ 姚蔚玲：《宁夏固原北朝墓葬初探》，《华夏考古》2022年第4期。

⑥ 王东：《北周李贤墓学术座谈会概述》，《宁夏社会科学》1984年第4期。

⑦ 王卫明：《北周李贤夫妇墓若干问题初探》，《美术研究》1984年第4期。

⑧ 杨泓：《北朝陶俑的源流、演变及其影响》，《汉唐美术考古与佛教艺术》，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年。

⑨ 杨泓：《略论北周李贤墓的陶俑和铁刀》，《宁夏文物》1989年第3期。

较少，但是墓葬中所反映出的文化特点极具研究价值。我们既可以分析固原北周墓葬中所体现的文化交流，又可以从世俗的角度窥探该时期为何存在具有这些文化特征的器物。故本文拟以当地纪年明确的北周墓葬为核心，研究北周时期当地的文化交流与发展。

三、研究方法

本文将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在研究实践中，主要采取的研究方法包括：

（一）历史文献法

历史文献法是史学研究中最基本、最常用的方法之一。面对纷繁复杂的史料，对其进行搜集和分析，从中选取相关信息，以达到研究目的。本文着重从《周书》《北史》《魏书》等相关的史书记载中进行查阅，从史书中整理分析当时的历史背景，结合中西方贸易、文化交流、道路交通状况等内容分析文物的特点。结合《固原州志》、嘉靖《平凉府志》、宣统《新修固原直隶州志》、乾隆《甘肃通志》等文献中所载固原及周边的史地资料，研究此地北周时期的文化交流。

（二）对比分析法

文章将结合相关图文资料，以及历史文献，对比研究这一时期的文物所蕴含的文化，探究它们之间的联系。

（三）田野调查法

实践是理论的基础。通过实地的调查、访问补充图文资料，加深对文化交流的认识。

四、重点、难点及创新之处

（一）论文的重点

本文将运用已经刊布的资料，结合历史文献研究当地北周时期的墓葬中所反映出的文化交流，了解当时的文化交流状况。研究过程中将发掘报告与史料记载相结合，分析这些文化出现的原因、影响和联系，加深对北周时期文化交流的认识。

（二）论文的难点

本文研究的难点主要在于分析文化因素，分析文物中反映的不同文化、看这一时期固原的文化交流，再探讨这一地区物质文化的继承与发展。

（三）论文的创新之处

本文以分析墓葬所见的文化为主线，运用相关著作、地方志、考古发掘报告等资料，力求从文物中分析出文化内涵，探讨北周墓葬中呈现的多元文化交流。现将本文的创新点归纳如下：

第一，选题的创新。目前学术界对北朝的考古学文化和固原北周时期的墓葬和文物进行了较多的研究。就其内容而言，研究多侧重于具有西域艺术风格的几件器物。本文旨在将两者结合，根据文物上的特定信息，分析墓葬中呈现的其他文化。

第二，笔者尽力通过多种渠道搜集资料，结合前人的研究成果分析北周时期的固原地区文化交流与互动情况。笔者在阅读资料时，发现前人研究该墓葬时集中于讨论中西文化交流，本文将在讨论中西文化交流的同时，讨论草原游牧民族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互动发展，并结合墓葬和相关史料分析多元文化形成的社会原因，探究北周墓葬所呈现的多元文化交流。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https://d.book118.com/248031130033006121>